



希望了解更多“新视界”报道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共账号“新民锦读”。这是一支图文并茂的“锦腴”,精心、精致、精彩。值得您的时间,值得您的收藏。

新视界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42期 | 2014年3月9日 星期日 责编:范洁 视觉:董春洁



《乡村里的中国》
更多视频花絮,
请扫描二维码



■ 封镜后,主创人员与送行的村民在“村儿电影社”所在的农家小院前合影

本报记者 姜燕

一个出身山东农村的著名摄影师,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“零经验”团队,一次373天的驻村拍摄,一部还未上映便已声名鹊起的纪录片——《乡村里的中国》。

影片获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纪录片大奖等八个大奖,看过的人说它:“这是一部为农民说真话的电影。”

纪录片里,镜头里展现的山村美景,勾起人们对世外桃源般生活的憧憬和向往;而农民掷地有声的话语,颠覆着人们对农村和农民的想象;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展现自我的欲望,又让人们看到希望。

照片提供
《乡村里的中国》摄制组

2012年春节,著名纪录片导演、摄影家焦波接下国家电影局一个“命题作文”,要求是找一个村庄,住上一年,拍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纪录片,不能拍成主旋律的宣传片,但也不能拍得很消极,要有种精神、信念和坚持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,焦波选定了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,翻过一座山就是他自己的家乡。

“第一次去杓峪村,还没确定下来,第二次再去时,在村里碰上了杜滨才和杜海龙,这两个大学生一个会跳街舞,一个说村里每年春节还办联欢会,这引起了我的兴趣。”焦波随即跟着杜海龙回家,见到了后来成为影片主人公的杜深忠以及他的妻子张兆珍。

杜深忠那年58岁,高中毕业,当过兵,喜爱写作、书法,拉着二胡想着琵琶,是农村里少有的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。焦波每每谈起,都很庆幸遇到杜:“我们这个片子如果没有杜这个人,层次要差很多。”



■ 剧奎博(右二)和北川(右一)在杜深忠家拍摄

张是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,曾经看中丈夫有文化,可没想到丈夫一辈子没能出人头地,干农活不顶劲,还整天花钱买书买本。家里的苹果也管得比别人少,“沂源红”苹果是当地农民创收的主要来源。

她用一口山东土话说:“焦老师,俺俩口子打了一辈子仗,你要是拍俺俩,就是一个战争片。”一句话,把焦波给逗乐了,这两口子,有戏。

2012年2月4日,农历正月十三,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,住进了村子,在院门上挂了一个牌子“村儿电影社”。

城市农民

村里人带着奇怪的目光看他们,搞不清楚他们是来干啥的,有人以为他们是部队派来拍电影的,有人以为是来搞调查的,还来反映什么情况。

咋让村民信任他们呢?焦波说:“我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,虽然我用上了微信,但老婆说我是个‘城市农民’,保存了许多农民的生活习惯。”

杜深忠对记者说:“焦老师那个人,俺上山他也上山,俺躺地上他也躺地上,俺吃啥他端起来就吃,从来不挑剔。俺都不敢相信,焦老师这个大摄影家,还能跟俺这样?”

拉近杜和焦的距离的,是有一次杜家一位本家老人去世,焦波也去拍摄。杜指着一座坟说,这就是俺爹俺娘的坟。“我说,噢,老人在这里,太不恭敬了。”焦波说,“然后我跪下,给老人磕了几个头。”从那以后,杜深忠对焦波更信任、也更亲切了。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说:“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。”这一对关系必须是平等的,相互信任和尊重的,才能形成创作上的良性互动。

春天的时候,杜看见村里有人“杀”树(当地人管砍树叫“杀”树),他

骂“都弄到城里搞绿化去了,这叫剃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”,结果被妻子一通抢白,说他多管闲事。杜被呛之后,活也不干了,和焦波坐下来闲聊,你聊你的过去,我聊我的过去。杜吐露心声:“焦老师,我告诉你,我20岁时候的梦想,到60岁也没破灭过。”

“那句话让我顿时觉得,这正是我要找的呀,这多难得!”焦波说,那时候已经拍了一个多月,还没摸着边,不知道到底要拍什么,“一个春天都在探索和寻找”。

沂蒙汉子

线索暂定未定时,三台摄像机分别蹲守在四个家庭里:杜深忠家、村支书张自恩家、房东张光爱家和杜滨才的父亲杜洪发家。张自恩说:“我走到哪,他跟到哪,我一站起来,他就跟上来,有时候都觉得烦。”在他家蹲的是身兼导演、摄像和剪辑三职的剧奎博,四川传媒学院大四学生,当时25岁。

张自恩是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,他38岁当村支书,当时已经干了10年。在片子里,县里派来的包村干部魏自军给村里修小广场,“杀”了村民的树,村民不找包村干部,只找张自恩“打仗”,张自恩也只好跟他打,护着包村干部。为了给村里找点旅游项目,他搭上市家的鸡蛋,到开发商家里去。村里有人想把他搞下来,他们来当,还有人查他的账,一年来把他折腾得不轻,他也骂“到时候我一个一个办他”。

焦波理解张自恩,“按张自恩的说法,他对付的是帮刁民,只能该打就打、该骂就骂,他不可能按书本上的方法去做,让写理论的人去干这个活,他干不了。”

张自恩有他的苦闷。有一晚,焦波接到张自恩的电话,“他问我在哪,我一听口气不对,就问他在哪,他说

老婆不在家,喝了点酒,在山上呢,你能不能来一趟。”焦波立马带着机器过去了。见到焦波,张自恩哭了,说:“焦老师,我太烦心了,你看弄点事,群众不满意,家里老婆孩子对我不满意,领导不满意,今天又批评我了,我心里难受。”

就这么一个沂蒙汉子,他受不了了,但第二天,该怎么样又怎么样,又恢复他那样子了——焦波说,这就是咱基层干部最真实的状态。

人肉换猪肉

片子里有三个泪点。小范围放映时,观众都是些对煽情的泪点很有抵抗力的人,看到最后都哭了。三个泪点其中之一是杜深忠的女儿小梅出嫁时,杜给女儿2万元钱。

小梅读初一那年,因为70元钱学杂费没有及时交上,再也不肯去上学,出门打工挣钱供弟弟读书。杜深忠夫妇一直觉得亏欠这个懂事的女儿。女儿最终找到好的归宿,结婚前夕,杜东拼西凑给她2万元,父女俩一番对话,令人唏嘘。

小梅是外出打工者中幸运的代表,不幸的代表是村民张自军,他在贵州打工时出事,没能抢救过来,骨灰被运回村里落葬,幼子披麻戴孝,天真地问:

“那是俺爸爸的家吗?”

有人答:“对了,这是你爸爸的家。”

“门口怎么这么小。”

“不小,这里头很宽敞。”

屋里,杜深忠带着怒气叹息:

“咱这些老百姓,咱这些山里孩子出去打工,真是一个要命的事,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,都是逼着出去的,出去是一把辛酸泪,打工的情况我知道——简直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。”

(下转 A15 版)